

中国动画电影技术迭代与美学创新的双重驱动

■ 文/贺宏福

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中国动画电影实现了深刻的产业转型与价值升级,从一度相对局限的创作领域,逐渐成长为推动电影产业发展、承担文化表达使命的重要艺术形式。其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机制,源于“技术迭代”与“美学拓界”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协同共生的动态关系。

技术迭代：超越视觉炫技,赋能美学创新

当前中国动画电影的技术发展,已超越单纯追求视觉冲击的初期阶段,进入以技术破解艺术难题、以创新凝练文化内涵的新时期。

首先,自主研发技术成为塑造“新国风”美学风格的关键路径。以《哪吒之魔童闹海》为例,影片中各项技术的运用紧密服务于其文化内核。为呈现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意境,制作团队专门开发了“动态水墨渲染引擎”,将水墨的渐变与浸润效果自然融入三维动画之中,使“蛟龙入海”等场景既保留古典韵味,亦蕴含强烈的现代张力与未来感。这种“科技+文化”的融合,并非是对传统的简单复现,而是借助技术媒介构建出一个既植根传统又充满新意的审美空间。同样,在二维动画领域,《浪浪山小妖怪》团队开创的“笔墨入镜”技术,通过手绘线条与数字渲染的深度融合,并对单帧画面进行多达五十层的精细处理,成功解决了中国传统水墨动画在动态表现中光影层次不足的长期难题。在此,技术直接参与定义了一种流动且兼具叙事性的东方视觉语言体系。

其次,工业化的制作体系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共同保障了技术在艺术创作中的扎实落地。《哪吒之魔童闹海》历时五年制作,汇聚全国138家公司的超过4000名专业人员,以协作联盟形式完成了从剧本开发到特效制作的全流程覆盖。影片中2427个镜头均经过反复打磨,诸如敖丙龙鳞的粒子动态衰减、哪吒火焰的色彩与形态渐变等细

节,其背后的算法调试与运动曲线设计,均服务于角色情感与叙事氛围的精准传达。这种“以情驭技”的创作理念,标志着中国动画产业已逐步摆脱早期作坊式生产模式,进入以标准化、系统化流程支撑艺术实现的工业化阶段。在二维动画领域,同样展现出不逊于三维制作的工业级投入与艺术追求。例如《罗小黑战记2》一场戏便耗时近一年精心打磨。由此可见,中国动画的技术迭代不仅体现为工具与流程的升级,其背后更凝结着以时间沉淀对抗流量速朽的匠心,使技术真正融入艺术表达的脉络。

美学拓界：从神话叙事到现实观照

随着技术不断进步,中国动画的美学视野与叙事格局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开拓。这种拓界体现在题材、视角、精神内涵与文化表达等多个层面,推动动画电影从一种娱乐产品升维为具有时代共鸣的文化载体。

其一,题材从神话宇宙向多元现实与未来想象拓展。尽管“西游”“封神”等传统神话仍是重要内容,但创作者已开始大胆跳出舒适区。《浪浪山小妖怪》将视角从齐天大圣转向无名小妖,通过小猪妖的职场遭遇与心灵成长,反映了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状态,让动画变得更贴近现实。

其二,叙事核心从塑造超级英雄转向关怀普通个体,精神内涵日益深化。中国动画的情感共鸣点,正从让观众为英雄事迹惊叹,转向让观众在角色中看见自身。《哪吒》系列的主题从“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个人呐喊,升华为“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的集体抗争与结构性思考,这种转变体现了对普通人价值的关注。《浪浪山小妖怪》中,小妖们踏上取经路最初的动机是保命,却在伪装的“英雄”行为中意外收获

了善意,进而主动选择为正义散尽修为。这种对平凡个体的书写,以及对家庭关系的细腻刻画,为宏大叙事注入了扎实的人文温度与当代性。

融合共生：双重驱动下的产业新生态

技术与美学的协同演进,正推动中国动画电影形成更具活力的产业生态。

从市场维度看,动画电影已成为国产票房增长的重要引擎。从《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到《哪吒之魔童闹海》,国产动画票房屡创新高,市场压舱石作用日益凸显。更为重要的是,其价值远超票房,如“熊出没”系列通过11部作品构建了涵盖衍生品、主题乐园的庞大IP生态,实现了产业价值的倍数溢出。

从文化传播维度看,动画成为跨越文化差异的轻骑兵。“哪吒”系列已发行至全球约50个国家和地区,其构建的宏大世界、创新的传统文化演绎与震撼的视听效果,获得了全球观众的赞叹。技术保障了美学体验的无损传递,而深刻且普世的美学内核则赋予了作品穿越文化屏障的力量。

近年来,中国动画电影的高质量发展,始终贯穿着技术迭代与美学拓界相互推动、彼此成就的清晰脉络。技术迭代为美学表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现手段与表现精度,而美学的不断拓展则为技术应用注入了明确的价值导向与人文深度。从《哪吒之魔童闹海》所代表的工业突破,到《浪浪山小妖怪》对水墨意蕴的当代诠释,这些实践共同印证了一条可行的创作路径:唯有秉持“以情驭技、以美引领”的创作原则,在扎根文化传统的同时,积极吸纳技术革新与叙事探索,中国动画电影方能在全球传播语境中,不仅生动讲述中国故事,更能够提供具有辨识度的美学风格与创作方案。

(作者系渭南师范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

影视艺术中红色音乐的育人内核：从革命叙事到新时代价值引领

■ 文/李亚倩

审美活动始终深度参与社会发展,通过精神引导成为推动变革的重要力量。影视艺术作为大众审美重要载体,其配套红色音乐不仅是艺术表达的组成部分,更承载着鲜明的革命叙事功能与隐性的育人内核。这种叙事并非单纯的艺术呈现,而是将革命理念、民族精神与大众情感相融合,实现思想的传递,构建集体认同的价值观。

影视艺术中红色音乐的革命叙事

左翼电影时期是红色音乐革命叙事的萌芽与奠基阶段。这一时期,红色音乐以新兴的有声电影为载体,成为传播进步思想的重要渠道。这一时期的创作群体继承了民族民间音乐传统的精髓,同时吸纳西方音乐创作技法,形成兼具艺术性与传播力的表达形式。其叙事内容以抗日救亡与民生疾苦为主,通过贴近民众生活的艺术表达,唤醒大众的民族意识与抗争精神,这种唤醒本身就是一种朴素的育人实践,使得家国大义通过民众与影视艺术的情感共鸣中扎根于其心中。并且音乐传播渠道的创新拓展,让革命理念突破地域与阶层限制,为后续革命叙事积累了群众基础与艺术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红色音乐的革命叙事进入系统化发展阶段。新中国逐渐建立了专业创作,使得音乐与影视画面、剧情叙事实现深度融合,既强化了艺术表现力,又让革命叙事更具感染力。这一阶段的叙事重点转向歌颂革命胜利、颂扬民族英雄与展现建设热情,通过激昂昂扬的旋律与朴实真挚的歌词,传递民众对国家的热爱,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时期红色音乐的象征意义不断丰富,既承载着对苦难历史的铭记,也强化了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的紧密关联,成为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纽带。

特殊历史时期,红色音乐的革命叙事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方面,音乐与政治表达的结合更为紧密,特定旋

律与符号被赋予固定的革命寓意,成为传递核心思想的直接载体;另一方面,民族音乐元素与西洋乐器的融合尝试,延续了艺术创新的探索。但这一阶段的创作也受到诸多限制,音乐的艺术独立性有所弱化,叙事形式趋于单一,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表达的丰富性。

改革开放后,红色音乐的革命叙事逐步实现创新转型。主旋律电影的兴起让红色音乐重新焕发生机,创作既保留革命精神内涵,又融入了现代审美理念与创作技法。新时代的红色音乐更注重情感动员,打造沉浸式体验氛围。其叙事内容既涵盖革命历史的回顾与缅怀,也包括对现代化建设成就的歌颂,让革命精神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得到传承与升华。

纵观发展历程,红色音乐的革命叙事始终与国家命运、民族复兴深度绑定,它通过艺术化的表达,将抽象的革命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情感体验,既记录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风貌,也创造了大众的国家认同与集体记忆。这种叙事方式不断适应时代变化,在坚守核心精神的基础上创新表达形式,至今仍发挥着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重要作用,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艺术载体。

影视艺术中红色音乐的时代价值

影视艺术中的红色音乐,早已超越单纯的艺术伴奏属性,成为承载精神内核、传递时代力量的重要载体。在文化强国建设与社会发展进程中,它既为大众提供精神滋养,又为民族文化传播注入持久动能,成为连接历史记忆与当代生活的精神纽带。

红色音乐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对社会价值观的正向引领上,其育人内核在此过程中尤为突出,尤其能滋养青少年精神成长,培育他们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在百年变局与技术革新带来的挑战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凝聚统一的

思想共识。红色音乐恰恰承载着红色文化的精神基因,蕴含着党的初心使命,通过影视媒介的广泛传播,将正确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大众可感知的情感体验。这种价值引领并非生硬说教,而是以艺术化表达让民众在正向精神的熏陶中确立正确认知,为文化强国战略筑牢思想基础,使得整个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导向。

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充实文化建设内容,是红色音乐的重要使命。红色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其蕴含的革命精神与历史内涵,需要红色音乐这类具象化的载体实现传承。红色音乐将民族精神融入旋律与歌词,在传播中完成精神的传递与延续。作为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音乐既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又能凝聚精神力量、增强文化自信。与此同时,它以丰富的内容形态拓展文化产业的边界,推动文化产业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创新,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内容支撑。

在艺术表达层面,红色音乐通过情感传递与音画融合实现深度价值转化。影视中的红色音乐既承载了人物角色的个体情感,又能将其升华为民族文化的集体共鸣,将悲痛、思念等情绪转化为鼓舞人心的力量,这种情感共鸣让革命精神更易被青少年接纳,在心中种下担当的种子。这种情感表达与影视画面形成紧密呼应,音乐强化画面的情感张力,画面赋予音乐更具体的叙事场景,二者相互成就形成独特的艺术合力,让红色音乐突破影视本身的传播边界,成为独立存在的文化符号,进一步扩大其精神影响力。

新时代的红色音乐更承载着文化传播的使命,在世界范围内传递中国态度。它既传承经典红色基因,又融入现代创作理念与传播方式,通过影视媒介的全球传播,将中国的革命精神、和平理念与发展立场传递给世界。

(作者系渭南师范学院音乐学院讲师)

影视化呈现中海事文化的语料表征与传播效果研究

■ 文/祖艳凤

海事文化作为海洋文化的核心分支,承载着航海技术传承、行业精神积淀与国际航运规则共识,其传播效能关系着海洋强国战略的落地与航运文化国际话语权的构建。而影视媒介以其具象化、故事化的传播优势成为了海事文化大众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近年来,《紧急救援》等海事题材影视作品陆续涌现,以震撼的视觉效果与动人的故事内核将海事场景推向大众视野,为海事文化传播提供了契机。

影视作品中的海事文化语料主要围绕海事活动的专业性与实践性展开,形成了兼具行业壁垒与传播张力的特征。这类语料既包含经过长期行业实践沉淀的专业术语体系,又融合了操作指令的简洁性与海上生活的情感温度。例如《紧急救援》等影片中船舶遇险时的应急指挥用语既保持精准严谨的专业属性,又在语气中暗含对生命安全的敬畏与团队协作信念。

同时,海事文化语料还带有鲜明的地域与历史印记,不同航区的港口方言与海事历史传承的特殊表述相互交织,如“郑和下西洋”相关影视作品中的古航海术语与现代海事通讯语言的衔接,既展现了海事文化的历史延续性,又通过影视作品的语境转化使专业语言变得可感可知,使观众在理解剧情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触着海事文化的语言内核。

当前影视作品对海事文化语料的传播在认知普及层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深入分析便会发现存在明显的深度不足的问题。创作者可采取以下策略改进海事文化语料的表达方式。

其一,围绕专业核心语料和文化拓展语料进行筛选。影视创作者在呈现海事文化样貌时,所筛选的语料符号应当打破单一化的专业呈现模式,构建兼具专业语料与文化语料的符号体系。专业核心语料是海事文化的“骨架”,其

筛选需兼顾专业性与可解读性,既涵盖《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的核心条款、船舶导航系统的操作原理等刚性知识,也包括引航员与船员的协同流程、危险品运输安全规范等实践内容,同时筛选时需避开过于晦涩的技术参数,优先选取与剧情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确保专业信息能自然融入叙事。文化拓展语料作为海事文化的“血肉”,则承担着深化精神内涵的责任,其筛选应围绕海事文化的历史传承、精神特质与人文价值展开,从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中提炼探索精神,从近代海员抵御外侮的历程中挖掘民族气节,在当代船员跨文化交流的故事中展现包容品格,这类语料补充能使海事文化超越行业范畴,联结大众文化认知,实现从职业认同到文化认同的升华。

其二,将语料符号与影视场景深度结合进行呈现。创作者需要结合影视情节、人物形象等传递海事文化语料,避免语料呈现的碎片化与生硬感,提升观众的接受度与认知深度。如《中国船长》使船舶遭遇恶劣海况的场景、船长下达“调整航向至135度,启动抗横倾系统”等指令与船员紧张的操作动作、雷达屏幕上的风浪预警信息实现联动,观众无需额外解读便能理解指令的紧迫性与专业性。同样在港口协作场景中,引航员与码头调度员关于“泊位水深”“靠泊角度”的对话可结合起重机的作业状态、船舶靠岸的动态画面展开,让语言符号承载的信息更加具象化。非语言符号与场景的融合则需注重意象构建,例如将船舶的形态、航海仪器的细节、船员的肢体语言与场景氛围深度绑定,在展现远洋航行的场景时,以夕阳下巨轮甲板上的航标灯为视觉核心,搭配船员整理缆绳的娴熟动作与海图上标注的航线轨迹,构建兼具工业美感与职业温度的画面,让非语言符号在该场景中传递“坚守”“远行”的文化意象,

使语料符号与场景相互赋能,增强传播的感染力。

其三,利用多平台联动强化海事文化语料的传播效果。影视正片一般在剧情中完成海事文化语料的基础传递,创作者还能够在影片结尾设置“海事文化小课堂”等彩蛋环节,对片中高频出现的专业术语、文化意象进行简要解读,引导观众进一步探索。在电影、电视剧等传统平台播出的同时,影视IP方还能够利用短视频平台剪辑“专业知识解读”“幕后故事”等片段,针对不同受众群体实施精准推送。例如面向青少年推出“趣味航海小知识”系列,将“船锚的作用”“信号旗的含义”等语料转化为动画短片;面向相关行业群体发布“影视中的真实海事操作”对比视频,结合影片片段解析实际作业规范,实现语料传播的精准触达。在互动传播层面,还可以在社交平台发起“我身边的海事故事”话题讨论活动,鼓励观众分享自身的相关海事经历,同时联动海事部门、航海院校等专业机构在平台上开展线上讲座、直播答疑等活动,对影视中的海事文化语料进行深度延伸,形成“影视正片引流—衍生内容深化—互动沉淀”的传播闭环,让海事文化语料突破影视内容的边界,实现更广泛、更持久的传播。

影视作为海事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其语料表征的科学性与呈现方式的创新性决定着海事文化传播的质量与深度。未来,海事文化的影视化传播更应注重语料的系统性挖掘与精准化呈现,让专业海事知识与深厚的海事精神在生动的影视叙事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作者系广州航海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基金项目:2025年度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高等教育专项》《粤港澳大湾区英汉海事双语语料库建设与应用》(2025GXJK0509)。

电影《恶意》作为一则媒介社会寓言,其叙事核心揭示了数字时代舆论演化的复杂链条,影片通过对一场虚构网络事件的完整呈现,精准映射了从“碎片化引爆”到“群体极化”,最终导向“社会性死亡”的生成逻辑。其价值不仅在于现象描摹,更在于对技术中介下的社会心理、信任缺失与治理困境的深刻揭露,为理解与应对当下舆情生态提供了关键的批判性视角。

媒介自反性：电影的叙事与网络逻辑的镜像

《恶意》的叙事起点,是一个被抽离语境、充满道德指控的信息片段,在注意力稀缺的竞争中,情绪张力而非事实完整性成为信息筛选与分发的首要标准。从“自反性”视角审视《恶意》的叙事结构,其本身就是对网络传播逻辑的模仿与批判。影片大量使用分屏、快速剪辑、弹幕覆盖画面、手机屏幕特写等视听语言,不仅呈现内容,更使媒介形态本身成为被审视的对象。德国电影理论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认为,电影具有揭示社会“表面现实”之下“心理模式”的能力。《恶意》中不断插入的社交媒体界面、闪烁的消息通知、飞速滚动的评论,恰恰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表面现实”——一种由碎片化、即时性、情绪化信息流构成的心理景观。

影片中那段关键戏——不同角色在各自封闭空间内对着屏幕做出相似愤怒表情的蒙太奇,成为詹姆斯·凯瑞所说的“媒介仪式”的视觉化呈现,他提出传播作为“仪式”而非“传递”的经典定义,舆情事件在这里成为维系特定世界观、强化群体认同的仪式性活动。电影通过平行蒙太奇,揭示了这种仪式的共时性与虚拟在场感,而角色的物理隔离则暴露了这种“联结”背后的实质孤独与隔阂。

拟态环境的双重构建与崩塌

电影中的角色生活在一个由算法筛选、情绪主导的次级拟态环境中——他们看到的是被加工、扭曲后的事件版本,沃尔特·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

浅析电影《恶意》中的舆论演化

■ 文/张亚琼

在影片中得到双重演绎,电影自身作为“拟态环境”的建构者,通过主观镜头、有限视角的叙事,让观众最初也陷入了与角色相似的认知局限。我们与角色的共享着同一种信息匮乏与情感驱动,直到影片后期更完整的信息被揭示,这种设计迫使观众进行自我反思:我们在现实网络中,也不常是这种不完整“拟态环境”的囚徒吗?影片中,网络上的符号斗争(表情包、口号式评论、标签)逐渐取代了对真实事件的关切,甚至开始重塑现实人际关系。一场发生在小团体间的私人纠纷,被加工成符合公共叙事模板的“道德剧”,其符号意义已完全脱离了原始事件的复杂肌理。电影的悲剧性正在于此:当伪真取代真实,判决便发生在事实澄清之前。

深刻揭示舆情中的“权力关系”

《恶意》的视觉修辞深刻地揭示了舆情中的权力关系。镜头语言有意构造了观看的等级:起初,观众与网民群体共享着对“被指控者”的俯视视角与道德优越感;随着叙事推进,镜头逐渐转向对被围攻者的特写,捕捉其逐渐崩溃的心理状态,观众被迫从“审判的共谋”转向“痛苦的见证者”。这种视角转换,是对网络暴力中视觉权力的批判——在舆情事件里,谁被看、如何被看、被谁看,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运作。

在《恶意》中从个体心理层面扩展到社会监视机制,方面无数匿名的、聚合的“凝视”通过银幕投射到个体身上,形成福柯意义上的“全景敞视主义”的当代变体。但这种凝视是割裂的、非连续的,它不追求真正的监督与规训,而只满足于瞬间的道德情绪发泄。影片中那个不断出现的、象征着无数眼睛的“围观直播”界面,成为扭曲社会凝视的绝佳隐喻。

叙事断裂与真相的不可抵达

与传统线性叙事不同,《恶意》采用了多视角、非线性的叙事策略,不同角

色提供的碎片化信息相互补充也相互矛盾。这种叙事上的“断裂”与“不可靠叙事”,本身就在形式上呼应了后真相时代的特点:不存在一个权威、统一的叙事版本,每个人都困在自己信息与偏见的牢笼中。观众如同在现实中一样,必须主动拼贴、判断,却永远无法获得“上帝视角”的全知真相。这种叙事策略带来的不适感,正是电影想让观众体验的认识论困境。舆情事件的爆发与失控,往往与制度化信任渠道的阻塞或效能不足相关联。当公众对正规机构的纠纷解决机制、信息透明度与公正性存疑时,网络空间便可异化为一种寻求“即时正义”与情绪宣泄的替代场域。影片中的公众愤怒,部分可解读为对社会不公的普遍焦虑、对权力失衡的无力感以及自身风险境遇的投射。然而,这种以网络暴力为手段、以摧毁个体为代价的“舆情审判”,非但不能修复社会信任,反而进一步侵蚀公共理性与法治根基,形成恶性循环。

《恶意》最终超越了针对特定现象的描绘,成为一面审视媒介化社会生存状态的“黑镜”。它运用电影独有的视听语法与叙事潜能,将抽象的传播理论——如群体极化、沉默的螺旋、议程设置——转化为可感、可怖的情感体验。电影在此不仅“反映”现实,更通过形式与内容的互文,执行了一种批判性的媒介干预。它提醒我们,在舆情汹涌的时代,重要的或许不仅是辨别信息的真伪,更是对我们自身认知方式、情感结构以及嵌入其中的媒介技术环境保持持续的自省。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意味深长:事件看似平息,但新的热点正在酝酿,界面刷新,循环即将开始。这暗示着,除非我们深刻理解并改变驱动这套逻辑的技术架构、社会心理与话语结构,否则《恶意》中的故事,将不仅仅是一部电影,而是我们不断书写的现实。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韬奋新闻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

《对联》杂志征订信息

《对联》杂志(原名《对联·民间对联故事》)创刊于1985年1月,由山西日报社主管。以教育普及、传承发展、学术研究为核心,面向社会大众,普及对联知识,提高鉴赏能力和创作水平。突出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实用性。

国内统一刊号:CN14-1389/I

国内邮发代号:22-88

定价:月刊,120元/年

订阅方式:全国各地邮局、“中国邮政微邮局”微信公众号、中国邮政报刊订阅网均可

十本以上集体订阅,直接联系《对联》期刊社

征订热线:15735155820 13269221236

广告